

老年人赡养对农村家庭创业的抑制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庄季乔

(西安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为了探究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家庭老年人赡养比的提升对家庭创业决策产生的影响效应,使用 Probit 模型,采用 2014—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家庭老年赡养比的提高显著抑制了农村家庭创业,且这种负向影响在男性户主与中西部的群体中更加显著;家庭老年赡养比的提高加重了子女经济赡养与生活照料负担,进而抑制了农村家庭创业;将老年父母隔代帮扶作为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发现老年父母隔代支持能够促进农村家庭创业,能够调节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研究表明,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逐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养老金水平,推广社会化服务等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支持和引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家庭建设,提供有关家庭管理、子女教育、老年人照护和心理健康的培训课程,为那些维持传统家庭结构的农村家庭提供经济补贴,支持和促进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活动和社区互动;重视老年人在农村家庭以及社会中所做出的贡献,加强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强化老年人健康管理及技能培训等,能够有效应对老龄化挑战并减轻农村家庭养老压力,从而减少家庭老年人赡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抑制效应,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家庭创业;老年人赡养;隔代帮扶;家庭养老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4)04-0126-17

收稿日期:2024-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ZZ068);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2023HZ1484)

作者简介:庄季乔(1993-),男,陕西勉县人,讲师,法学博士。

Inhibitory effect of elderly care on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ZHUANG Jiqiao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increase in the family elderly care ratio due to rural aging on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this paper employs the Probit model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spanning 2014 to 2020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family elderly care ratio significantly inhibits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This negative impact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among male owners of households an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The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the increased elderly care ratio exacerbates the economic and caregiving burdens on children, thereby hindering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Furthermore, tes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rom elderly parents indicates that such support not only promotes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but also mitigat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elderly care ratio on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The study suggests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social insurance,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basic pension level of rural pension insurance,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services. Additionally, it advocates for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rural famil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providing training courses on household management, children's education, elderly care, and mental health, offering economic subsidies to rural families maintaining traditional family structures, and promoting family-based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community interactions. In addi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emphasiz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elderly to rural households and society, enhance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and strengthen elderly health management and skills training. These measures are essential strategie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aging, alleviate the elderly care pressure on rural families, reduc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elderly care on household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elderly car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amily elderly care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十四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导向、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等作出全面安排,提出增强农业农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和“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持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农村家庭创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不仅提升了农村社会与居民的福祉,还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对于农村社会而言,在面对经济波动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创业更显得意义非凡,已然成为带动农村社会财富积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2]。对于农民来说,家庭创业不仅仅是维系家庭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手段,更是关系到个体幸福感和价值感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有助于保持家庭结构的稳定,成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有力支撑^[3]。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4]。为此,应当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制定人才、财税等优惠政策,为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创业,激活农村的创新活力。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逐步将农村家庭创业置于宏观政策层面,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不论是每年颁发的“中央一号”

文件,还是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都清晰展现了顶层设计对农村家庭创业的重视和支持。因此,农村家庭创业已经不仅仅是一项富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活动,更是一个值得积极探索和深入挖掘的新领域。

纵观当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研究,影响因素方面凸显了个体认知与行为,以及家庭内外环境对创业抉择的影响。在个体认知方面,提升个体认知能力可以促进创业意愿并增加创业收入,因为个人认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强人力资本,从而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意愿^[5]。在家庭内部条件方面,农村家庭创业意向和行为可能会代际传递,父母的创业行为也可能影响孩子的创业意愿^[6]。然而,这种影响可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父母的创业行为可能会削弱孩子的创业意愿,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7];另一方面,创业家庭的孩子可能愿意接管父母的生意,实现家庭创业的传承^[8]。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突发性事件会影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9]。在家庭外部制度环境方面,农村家庭创业面临流动性约束和社会关系网络等条件的影响也会延伸至农村家庭创业^[10-12]。

然而,现有文献忽略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家庭创业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事实上,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家庭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不仅可能影响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率,而且对家庭财务规划家庭经营策略等均可能产生重要的作用。童玉芬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劳动力供给会产生负面影响^[13];有学者实证检验了老龄

化对家庭消费与储蓄的影响,发现老龄化分别具有“挤出效应”与“引致效应”^[14]。鉴于家庭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可能会对家庭层面的各种决策产生影响。那么,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农村家庭层面的创业决策过程中,是否也可能受到劳动力结构老龄化的影响呢?

基于此,本文尝试探究家庭老年人口与农村家庭创业之间的联系,并回答家庭代际互动是通过何种机制去影响农村家庭创业这一重要命题。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家庭老年赡养比的提高显著抑制了农村家庭创业,且这种负向影响在男性户主与中西部的群体中更加显著。影响机制分析显示,家庭老年赡养比的提高加重了子女经济赡养与生活照料负担,进而抑制农村家庭创业。此外,将老年父母隔代帮扶作为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发现老年父母隔代支持不仅能够促进农村家庭创业,还能够调节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研究的贡献有以下几点:一是在“父母-子女”这对分析模型下,现有文献集中关注到了单方面上父母对子女创业的影响,而忽视了子女对父母创业的逆向作用。二是在家庭人口结构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分析层面,忽视了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家庭形成的创业结构,而这一结构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因而需要关注农村家庭创业中多代代际传递的样态。三是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代际传递并非局限于个体认知与外部环境的作

用,也受到家庭内部人口结构的制衡。因而,本文进一步探究家庭人口结构与农村家庭创业之间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层面丰富家庭老年人口与农村家庭创业的联系,也从经验层面为相关农村养老与创业政策提供建议。

一、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探讨农村家庭老年人赡养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并从“父母-子女”及“子女-父母”两条路径建构家庭对创业作用的机制。并且,本文所论证的“父母”为老年一代,“子女”指中年一代,兼论述“孙子女”即少年一代,因而研究跨越老、中、少三代。鉴于此,本部分主要从家庭养老与隔代照料两个视角对农村家庭创业形成的影响展开论述。

(一) 家庭养老与农村家庭创业的关系

反馈理论认为亲子关系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观点得到了费孝通的支持。他指出,亲子关系不仅是人类再生产的基础,也构成了社会群体的基石,是每个人最亲密的社会生活核心。在亲子关系中,赡养更是其核心内容之一^[15]。刘一伟强调了子女对父母赡养的义不容辞的责任^[16]。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中,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责任,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父母为子女的成长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辛劳,而子女则有责任在父母年老时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这种亲子间的

相互扶持和尊重,不仅体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也彰显了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因此,赡养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义务,更是一种社会伦理与情感的表达^[17]。

目前,中国已经迈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家庭养老的负担加重^[18],这可能会影响子女的家庭创业。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3个主要因素:

第一,情绪转移。情绪转移是指个体在面对家庭养老任务时,由于赡养事务的琐碎和繁杂,可能导致其无法集中精力投入创业事业中,从而降低了家庭创业的可能性^[19]。具体而言,一是家庭养老任务的繁琐性可能会使创业者的情绪受到影响。作为子女,面对父母的养老需要,创业者可能会感到责任重大、压力巨大。长期以来,繁杂的赡养事务可能会导致创业者情绪逐渐消极,产生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影响其工作效率和创业动力^[20]。二是在家庭养老任务压力下,创业者可能会陷入情绪低谷,导致其难以保持清晰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这可能会影响其对商业机会的把握和决策的果断性,也可能使其缺乏创新思维和应对挑战的勇气。长期下来,情绪转移可能会使创业者陷入困境,无法有效地应对市场竞争和经营风险,从而影响家庭创业的成功可能性。

第二,资源转移。资源转移主要包括到时间和经济资源的转移。家庭养老任务需要创业者分配大量时间和经济资源,这可能会影响到创业者的创业倾向和可能性。从时间资源的角度看,创业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这会影响到他

们用于创业的时间资源。在家庭养老任务的压力下,创业者可能不得不放弃部分原本可以用于创业的时间,转而投入到赡养父母的工作中。这意味着创业者在创业事业上的经济投入、时间精力会受到限制,从而降低了其创业的倾向和可能性^[21]。特别是在创业初期,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打造业务、建立品牌,家庭养老任务所占据的时间可能会成为创业者面临的重要障碍。从经济资源的角度看,赡养父母可能会给创业者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挤占了创业的经济资源。家庭养老需要支付的医疗费用、生活费用等都会消耗创业者本可以用于创业的资金,从而降低了创业的可能性^[22]。特别是在创业初期,资金的需求通常较大,创业者需要不断地投入资金来支持企业的运营和发展,而赡养父母带来的经济负担可能会使创业者难以满足这些需求,从而影响到创业的顺利进行^[23]。

第三,责任压力。它可能是创业者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创业者需要同时满足创业、家庭的需求与责任,这可能导致冲突和压力的产生。工作-家庭理论认为,家庭角色的参与可能使创业角色变得更加困难。创业者不仅需要承担起创业所带来的责任和压力,还需要履行家庭中的角色。这种双重角色的承担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创业者需要在创业事业和家庭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24]。在家庭养老的情境下,子女可能面临着来自照料老人的责任压力和创业事业的压力,这两者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使创业者感到无法有效地进行创业活动。例如,当创业

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料父母时,可能会影响到其在创业领域的投入和精力,导致创业进程受阻或进展缓慢^[25]。除此之外,责任压力还可能加剧创业者的心理负担。创业者不仅需要应对来自事业上的挑战和压力,还需要承担起家庭责任带来的压力,进而影响到其创业活动的进行和成果的取得^[14]。

(二) 隔代帮扶与农村家庭创业

在一个强调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的社会中,老年父母对其整个家庭福利的贡献受到高度重视^[26],贡献的核心在于老年父母能够进行隔代帮扶,以此促进子女的创业行为并间接创造了家庭福利,可以归因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当前人口快速老龄化、社会转型和快速城市化的多重背景下,隔代抚育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趋势。在中国,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家庭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协助子女照料孙辈,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7]。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8 年的数据,有 48% 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对其 16 岁以下的孙子女提供过时间上的照顾。这意味着大量的老年人正在参与到子女的抚育工作中,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老年人协助子女照料小孩的行为,减轻了子女抚养孩子的负担,使得子女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家庭创业^[28]。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有了老年人的参与和支持,子女在创业过程中可以得到

更多的鼓励和支持,有更多的人可以共同分担风险和责任,提高了创业的成功率和可持续性。

第二,隔代帮扶能够减轻农村子女的经济负担,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他们的家庭创业活动。对于初始家庭创业的年轻子女而言,面临着购房难、生活压力大等经济困境是常见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年父母对子女家庭的隔代帮扶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减轻子女的经济压力^[29]。更为具体的,由于老年父母参与了孙辈的照料,子女们无需雇佣保姆或其他护理人员,从而节省了一部分家庭开支,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于创业资金,为子女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和发展机会^[30]。与此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老年父母会将自己的房产或者提供住房首付款等财产转移给子女,从而帮助子女解决住房问题。这种住房支持不仅减轻了子女的生活压力,也为他们提供了更为稳定的生活环境,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投入到创业活动中^[31]。需要指出的是,隔代帮扶也有助于子女财富的原始积累。通过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和住房支持,子女们可以更快地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基础。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可以成为子女创业的资金来源,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可能性。

综上可知,学者们分别重点研究了家庭养老与隔代照料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并未将三者放到统一框架内进行思考。一是本文将家庭的代际传递设置为三代,即不仅探究一般意义上“父母—子女”的代际传承,而且将祖辈这一老年群体也纳入分析模型,探

索老、中、少三代人的代际传递。二是本文探索家庭代际支持双向互动,即从一般层面上的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加入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呈现代际互动的研究图景。从“家庭养老”与“隔代照料”的双重视角切入,回答家庭养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家庭创业,是否会增加创业者的负担?老年人帮助子女照料孩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家庭创业,是否会减轻创业者的负担?三是本文归纳家庭代际互动影响创业活动的共同作用机理,从而为明确农村家庭创业活动提供理论性与经验性的帮助。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建构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该数据每两年开展一次,主要通过对全国样本家庭、居民等进行追踪调查,旨在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等状况。CFPS调查于2010年开展第一次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从中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了162个区、县中649个村(社区)作为调查单元,一共约20 000户参与了此次调查。本文主要变量采用2014年、2016、2018和2020年CFPS调查数据,但是由于2016、2018与2020年开展的调查没有在村级层面开展,所以并未包含村级层面的调查样本。中国从2001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农村空心化和空巢老人赡养问题成

为影响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2015年6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考虑到村级层面的变量相对稳定,而村级层面数据均来自CFPS 2014年的村级层面调查,且2014年的数据也能说明文章论述的相关问题。由于创业者基本上都是青年或者中年群体,因此本文把研究对象设定在年龄18—60岁农村被访者;同时选取老年父母至少健在一位的被访者;剔除不相关和缺失的变量,最终选择样本量8 841个被访者。

(二)变量选取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村家庭创业。参考周广肃等学者的研究^[32],本文根据问卷中的问题“过去一年您家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进行定义家庭创业决策,将其设置为二值虚拟变量,如果回答是,则定义创业取值为“1”,否则为“0”。同时,本文选取“扣除成本,过去12个月您家所有的个体经营或私营企业税后利润多少钱?”这一问题来衡量农村家庭创业利润状况,分析时取对数。

本文的自变量是家庭老年赡养比。老年赡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参考汪伟等学者的相关研究^[30],本文采用家庭老年人口数(60岁及以上)与家庭劳动人口数之比测度家庭老年赡养比。

为了捕捉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净效应,本文选取了户主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与村庄特征3个层次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户主人口学特征变量主

要包括性别(0 = 女,1 = 男)、年龄(调查年份 - 出生年份)、婚姻状况(0 = 未婚,1 = 已婚)、教育程度(1 = 文盲,2 = 小学,3 = 中学,4 = 高中,5 = 大专,6 = 本科,7 = 本科以上)、宗教信仰(0 = 否,1 = 是)、政治面貌(0 = 否,1 = 是)、社会保险(0 = 否,1 = 是)。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元,对数)、家庭土地亩数与家庭社会地位。村庄特征主要包括村距离乡镇距离、村距离县城距离与雇佣工人价格(元/天)。

(三) 模型建构

本文使用 Probit 模型估计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Entrepre_i^* = \alpha + \beta_1 Aging_i + \gamma_i X_i + \varepsilon_i$$

$$Entrepre_i = 1 (Entrepre_i^* > 0) \tag{1}$$

式中: i 为农户; $Entrepre_i$ 代表农户是否进行家庭创业,若是,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Entrepre_i^*$ 是潜变量; $Entrepre_i^* > 0$ 时, $Entrepre_i$ 取值为 1,否则为 0。 $Aging_i$ 代表家庭老年赡养比变量; X_i 为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村庄层面变量与省份固定效应; α 是回归方程的常数项; β_1 与 γ_i 分别表示家庭老年赡养比与控制变量的系数;随机扰动项 $\varepsilon_i \sim N(0, \sigma^2)$ 。

为考察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利润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 Tobit 模型

$$Entrepre_profit_i = \alpha + \beta_1 Aging_i + \gamma_i X_i + \varepsilon_i \tag{2}$$

式中: $Entrepre_profit_i$ 代表农村家庭创业利润的对数值,其余各变量解释与式(1)相同。

表 1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分析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因变量	家庭创业	0 = 否,1 = 是	0.105	0.307	0	1
	创业利润(元)	创业利润(元)	0.911	2.870	0	12.766
自变量	家庭老年赡养比	家庭老年人口/家庭劳动人口数	0.419	0.228	0.071	1
控制变量 人口学特征变量	性别	0 = 女,1 = 男	0.576	0.494	0	1
	年龄	调查年份 - 出生年份	43.743	8.636	18	59
	年龄平方项	年龄平方项/100	19.880	7.394	3.240	34.810
	婚姻状况	0 = 未婚,1 = 已婚	0.907	0.291	0	1
	教育年限	1 = 文盲,2 = 小学,3 = 中学,4 = 高中,5 = 大专,6 = 本科,7 = 本科以上	2.339	1.097	1	7
	宗教信仰	0 = 否,1 = 是	0.133	0.340	0	1
	政治面貌	0 = 否,1 = 是	0.118	0.323	0	1
	养老保险	0 = 否,1 = 是	0.647	0.478	0	1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收入(元)	家庭总收入(元)	10.231	1.225	0	14.509
	家庭地位	1 = 非常低,2 = 比较低,3 = 一般,4 = 比较好,5 = 非常好	3.200	0.939	1	5
	家庭土地	0 = 无,1 = 有	0.912	0.283	0	1
	家庭存款(元)	家庭存款(元)	5.955	4.773	0	13.816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	4.109	1.953	1	17
村庄特征	村距乡镇距离(里)	居住地到乡镇距离	1.939	0.977	0	5.707
	村距县城距离(里)	居住地到县城距离	3.596	1.030	0	5.638
	雇佣工人价格(元/天)	雇佣工人的价格	4.557	0.454	2.398	5.707

表 2 老年赡养比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基准回归)

变量	创业决策		创业利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家庭老年赡养比	-0.485 *** (0.095)	-0.393 *** (0.099)	-0.318 ** (0.133)	-0.141 (0.134)
个体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常数项	0.696 (0.469)	-0.055 (0.589)	-1.641 ** (0.716)	-2.199 ** (0.860)
R ²	0.098	0.133	0.063	0.089
Observations 样本量	8 887	8 841	8 887	8 84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时间和精力)应用于一个角色时,说明他们高度重视在自我概念中扮演的角色。虽然个人能够对多重角色做出强有力的承诺,但在遵守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前提下,通常会导致男性更多地参与创业工作,而女性更多地融入家庭生活。大多数研究家庭与创业联系中的性别差异时也均发现:女性比男性经历更多的家庭与创业的冲突。这源于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同的角色、行为动机和选择、企业家经历等多个要素^[33]。因为女性作出参与创业的决定似乎比男性更复杂,女性会综合考虑创业目标、家庭目标以及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角色。因此,“创业-家庭”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可以通过身份和价值观的个体差异来解释。

简而言之,当面对创业与家庭两者之间的冲突时,男性可能优先考虑采取促进创业业务增长的策略,而女性可能会采取限制创业业务的策略,即选择放弃创业。因为女性显然比男性更优先考虑工作和家庭之中的角色,并需要在这两种角色之间作出不可避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

表 2 报告了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在模型(1)中,家庭老年赡养比在 1% 的显著水平,系数符号为负。考虑到不同省份的家庭创业环境等各不相同,模型(2)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家庭老年赡养比依然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由于 Probit 模型估计系数不具有实际经济学意义,本文计算了该变量的边际效应分别为 -0.069 与 -0.058,说明家庭老年赡养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村家庭创业概率分别下降 6.92 与 5.84 个百分点。在模型(3)中,家庭老年赡养比在 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家庭老年赡养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家庭创业利润就下降 31.80 个百分点。模型(4)中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虽然家庭老年赡养比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家庭创业利润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 异质性分析:性别差异与区域差异

家庭代际互动与创业联系中主要包括两类差异:一类是性别差异,另一类是区域差异。

先分析性别差异。工作-家庭理论研究中较为认同这样一个前提:当个人积极参与角色时,他们会发展与角色相关的身份并对角色形成强有力的承诺。当个人有意将资源

免的权衡。所以女性面对家庭养老时会更多地考虑其在家庭中的角色,更愿意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当老人愿意为家庭减轻照料孩子的负担时,女性相较于男性压力变小,更有灵活的时间与意愿安排属于自己的创业行为。然而,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名言。生养子女以防备年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也是以子女为养老核心和以自我储蓄应对养老风险的家庭养老机制良性运行的关键^[16]。一般而言,男性作为家庭的“顶梁柱”肩负着养家糊口的职责。此外,不同性别的农民风险偏好不同,而创业作为一种风险投资行为,也存在性别差异。

对此,我们分析了家庭老年赡养比对不同性别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从表3中模型(1)和模型(2)可见,对农村女性而言,虽然家庭老年赡养比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但是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女性家庭创业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对农村男性而言,家庭老年赡养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可见老年赡养负担越重的男性,农村男性家庭创业的可能性越低。

再分析区域差异。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无论是农村家庭创业环境还是老龄化程度,均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一是较之于中西部地区,就创业的“软环境”包括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及政府行政能力水平和态度等,与创业的“硬环境”包括地理条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等而言,东部均可能处于优势,

表3 异质性分析:性别与区域差异

变量	女性	男性	东部	中西部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家庭老年赡养比	-0.086 (0.175)	-0.434 *** (0.133)	-0.429 ** (0.206)	-0.379 *** (0.12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常数项	-1.200 (1.025)	1.767 ** (0.750)	-4.854 *** (1.233)	0.844 (0.624)
R ²	0.099	0.228	0.215	0.153
Observations 样本量	3 773	4 821	2 818	6 02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从而能够提高农户家庭创业的积极性;二是就老龄化程度而言,与中西部区域相比,东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更为严格,这不但影响了农村家庭结构和禀赋积累,还导致家庭规模更小,“4+2+1”家庭组成结构正成为城镇家庭的“标配”,这意味着东部区域家庭的赡养负担更重。

为了考察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本文按照居住地属性将全样本分成东部与中西部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根据表3中东部地区的模型(3)和中西部地区的模型(4)可见,家庭老年人赡养比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不同。对于东部地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东部农户家庭创业的概率将下降5.45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家庭,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西部农户家庭创业的概率将下降5.6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西部农户对家庭老年赡养比的变化更加敏感。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以上结论是否可靠,我们需要

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如果在不同的条件或假设下,结论保持不变,那么结论就是稳健的。相反,这个结论是值得怀疑的,需要找出原因并解释。通过改变代理变量和重新测量指标,也有可能证明该模型的稳健性。

1. 替代被解释变量

由于家庭创业还包括家庭经营总资产等其他维度的测量指标,因此,本文选取家庭创业的总资产作为被解释变量。在 CFPS 调查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过去 12 个月您家所有的个体经营或私营企业经营的总资产多少钱?”我们将其操作化为连续变量,分析时取对数,估计结果如表 4。结果显示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户家庭创业总资产具有负向影响,即家庭老年赡养比越高的农户,家庭创业总资产也越少。

2. 改变样本容量法

控制变量中家庭收入、家庭存款、村(社区)到县城距离等连续性变量可能存在极端值,造成估计偏差。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 1% 与 5% 缩尾处理,以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还去掉了 2020 年的分析样本^①,以排除样本容量大小造成的估计偏误。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改变分析样本后,家庭老年赡养比依然能够降低农村家庭创业的可能性,但是对家庭创业利润没有显著影响。

3. 排除政策性因素干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3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此同时,中

表 4 替代变量法:老年赡养比对家庭创业总资产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模型(2)
家庭老年赡养比	-1.269 *** (0.024)	-1.043 *** (0.0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Constant 常数项	5.659 *** (0.125)	6.852 *** (0.126)
R ²	0.065 3	0.114 5
Observations 样本量	8 887	8 841

表 5 改变样本容量法

变量	Panel A:创业决策			Panel B:创业利润		
	1%缩尾	5%缩尾	去掉 2020	1%缩尾	5%缩尾	去掉 2020
家庭老年赡养比	-0.117 ** (0.035)	-0.117 ** (0.036)	-0.114 *** (0.032)	-0.015 (0.025)	-0.015 (0.025)	-0.013 (0.0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常数项	0.231 ** (0.096)	0.195 ** (0.092)	0.020 *** (0.007)	0.016 ** (0.008)	0.0308 ** (0.012)	0.026 ** (0.012)
R ²	0.126	0.126	0.167	0.052	0.052	0.072
样本量	8 887	8 841	8 887	8 841	8 887	8 841

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对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所以,乡村振兴战略可能影响老龄化对家庭创业影响的净效应。另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长期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基本医疗护理,降低“三明治”(指代有未成年子女抚育与有老年父母照料的家庭)家庭因照料老人而造成健康损失的可能性。2016 年 7 月,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确定了 15 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对此,本文尝试排

① 本文也对删掉其他年份的调查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除乡村振兴战略与长期护理保险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出在创业决策模型中,家庭老年赡养比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而在创业利润模型中,家庭老年赡养比的估计系数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再次印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 6 排除政策干扰

变量	创业决策		创业利润	
	排除乡村 振兴战略	排除长期 护理保险	排除乡村 振兴战略	排除长期 护理保险
家庭老年赡养比	-0.193 *** (0.025)	-0.170 *** (0.029)	-0.035 (0.106)	-0.021 (0.0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常数项	2.024 *** (0.005)	2.038 *** (0.006)	2.023 * (0.013)	2.045 *** (0.006)
R ²	0.098	0.133	0.063	0.089
Observations 样本量	8 887	8 841	8 887	8 841

4. 内生性估计:工具变量法

准确估计基准模型可能面临着内生性问题,如由于影响农村家庭老年赡养比的变量较多,其中有些不可观测的变量可能同时会影响到家庭创业决策。另外,不但老年人数会对创业产生影响,也可能存在一种相反的机制,即农村家庭创业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数量。对此,本文将被访者村庄的家庭老年赡养比作为家庭老年赡养比的工具变量,对这一问题进行纠正。农村家庭老年赡养比为连续变量,家庭层面的老年赡养比是村庄家庭老年赡养比的子集,二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农村家庭创业行为并不能反过来影响村庄家庭老年赡养比,符合外生性要求^[21]。

表 7 中第一阶段的结果显示,农村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家庭老年赡养比的影响的确显

表 7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模型(1)	模型(2)
家庭老年赡养比		-0.984 *** (0.338)
工具变量	0.922 *** (0.035)	
常数	0.004 (0.055)	0.816 (0.5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 F 值	442.86	
外生性试验		85.150 *** [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中括号内为 P 值。

著为正,且系数较大,证明这一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且第一阶段的 F 值为 442.86,外生性试验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村家庭老年赡养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老年赡养比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即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有显著负向影响。

四、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

(一) 影响机制:家庭养老的检验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家庭养老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关怀和照料,包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方面的支持。这些需求通常需要家庭成员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满足,从而增加了家庭养老的成本和负担。家庭养老所需资源的增加导致家庭资源供给可能会受到限制。在农村地区,许多家庭的资源相对有限,可能面临着收

人不足、教育水平低下等问题。因此,当家庭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时,其他方面的支出可能会受到影响,包括家庭创业所需的投入和资金。同时,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家庭可能不得不优先考虑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而减少对创业活动的投入。这可能表现为家庭成员放弃创业的机会,选择寻求稳定的工作或其他收入来源,以满足家庭的养老需求。因此,家庭养老所需资源增加可能会对家庭创业产生抑制效应。

表8显示了老龄化对家庭老年赡养比的影响。本文将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均操作化为二分虚拟变量,其中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研究发现,家庭老年赡养比均在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家庭老年赡养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子女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的概率分别提高约9.26与4.51个百分点,表明老年赡养比越高的家庭,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越多。由此可见,农村家庭老年人口越多,家庭养老所需的养老资源越多,受限于家庭资源约束,会对家庭创业产生抑制效应。

(二) 调节效应:隔代帮扶的检验

表9显示了隔代帮扶对老龄化与农村家庭创业关系的调节效应。同家庭养老一样,我们将老年人对子女或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操作化为二分虚拟变量,其中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2)和模型(4)中,父母经济支持与父母隔代照料分别在5%与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表明父母隔代帮扶对农村家庭创业具有促进效应。同

表8 老龄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变量	(1)	(2)
	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
家庭老年赡养比	0.454 *** (0.083)	0.202 ** (0.0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Constant 常数项	-1.119 ** (0.465)	-2.294 *** (0.504)
Pseudo R ²	0.103	0.124
Observations 样本量	8 850	8 84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表9 隔代支持的调节效应

变量	家庭创业决策			
	(1)	(2)	(3)	(4)
家庭老年赡养比	-0.384 *** (0.099)	-0.311 *** (0.102)	-0.380 *** (0.099)	-0.226 ** (0.105)
父母经济支持	-0.111 (0.083)	0.409 ** (0.192)		
家庭老年赡养比× 父母经济支持		1.373 *** (0.480)		
父母隔代照料			0.059 2 (0.059)	0.511 *** (0.121)
家庭老年赡养比× 父母隔代照料				1.330 *** (0.3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常数项	0.031 6 (0.599)	-0.234 (0.607)	-0.125 (0.585)	-0.225 (0.583)
Pseudo R ²	0.133	0.134	0.132	0.136
Observations 样本量	8 841	8 841	8 841	8 84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时,家庭老年赡养比与父母经济支持的交互项及家庭老年赡养比与父母生活照料的交互项,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父母隔代支持能缓冲老龄化对家庭创业带来的负向效应。

根据费孝通的家庭交换理论^[15],老年父

母提供给子女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目的则可能是为建立与成年子女的协商式亲密关系,父母所提供的每一次帮助本身在客观上都会进一步认定和强化双方的亲密关系,而老年父母对这种亲密代际关系的维持是为了获取子女的回报。因此,老年父母给予隔代帮扶,本质上是为了获取子女家庭对其养老作为回报,致使老年父母隔代帮扶起到缓冲老龄化对农村家庭创业的负向冲击。

五、政策建议

近年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催生了数量众多的市场新生力量,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经济行稳致远的活力之源。但是,中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甚至高龄化社会,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家庭老年人口与农村家庭创业的关系如何是一个亟需关注的社会问题。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老年人口与农村家庭创业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家庭老年赡养比依然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同时,将子女家庭养老作为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发现家庭老年赡养比的提高加重了子女经济赡养与生活照料负担,进而抑制农村家庭创业。此外,将老年父母隔代帮扶作为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发现老年父母隔代帮扶能够促进农村家庭创业,并调节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

本研究认为在客观评估老年人口对中

国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同时,更需要重视他们在农村家庭创业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中国政府有必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逐步覆盖多层次的农村老年群体,构建带有中国特色的农村老年人福利保障体系。这不仅有助于减缓农村家庭结构转型给家庭养老带来的压力,还有助于实现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的良好互动,从而解决农村家庭创业的后顾之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能够有效应对老龄化挑战并减轻农村家庭的养老压力。一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政府应扩大农村社会保险的覆盖面,确保所有农村老年人都能获得基本的养老保险。这可以通过降低参保门槛、提供财政补贴和鼓励非正规就业人员参保来实现。二是提高保险待遇。逐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养老金水平,确保其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此外,根据物价和生活成本的变化适时调整养老金。三是推广社会化服务。在农村地区推广养老服务设施和居家养老服务,包括日间照料中心和长期护理设施。通过政府资助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四是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立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组成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鼓励农民通过个人储蓄和商业养老保险增强养老保障。

第二,支持和引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家庭建设。一是提供有关家庭管理、子女教育、老年人照护和心理健康的培训课程

程。这些课程旨在帮助农村家庭成员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同时强化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二是为那些维持传统家庭结构的农村家庭提供经济补贴,特别是多代同堂的家庭。通过减免税收、提供养老和教育补贴等方式,鼓励家庭成员居住在一起。此外,支持和促进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活动和社区互动,如家庭文化节、家族史研究以及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加强家庭成员间的联系和文化认同。

第三,重视老年人在农村家庭以及社会中所做出的贡献,并采取以下措施为他们提供适当的保障和支持。譬如,加强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提供定期的健康检查、慢性病管理和家庭医生服务,确保老年人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与此同时,开设针对老年人的教育和技能培训课程,帮助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同时充实他们的生活。这些课程可以包括计算机操作、传统手工艺等。此外,鼓励社会参与,开展以老年人为主体的志愿服务项目,鼓励他们在社区服务、文化传承、教育辅导等方面发挥作用。通过这些活动,老年人不仅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还能增强他们的社会价值感和成就感。

六、结语

本文对家庭老年人口与农村家庭创业的关系进行初步的研究分析,明晰了家庭老年人口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作用机理,这对于

改善农村家庭创业活力与助力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具有一定创新性,但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研究数据可能未能涵盖中国所有省份,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本文主要关注经济赡养与生活照料负担,对于文化、情感等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探讨不足,这些因素同样可能对农村家庭创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针对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拓宽数据来源,特别是增加多样化地区的样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家庭文化和情感因素如何影响农村家庭的创业决策,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干预优化这些影响,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并促进农村地区的家庭创业活动。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仅为理解农村家庭创业的家庭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浩林,王子鸣.网络“互嵌”与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兼论共同富裕实现[J].中国农村经济,2022(9):63-81.
- [2] 李祎雯,张兵.非正规金融与农村家庭创业成效: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J].农业技术经济,2018(12):4-17.
- [3] 杨舒然,雷晓康.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4(2):56-68.
- [4] 人民网.习近平要求乡村实现“五个振兴”[EB/OL].(2018-07-16)[2024-01-16].<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716/c1001-30149097.html>.
- [5] 张要要.数字鸿沟与农户家庭创业[J].山西

- 财经大学学报,2022(2):103-114.
- [6] CHLOSTA S,PATZELT H,KLEIN S B,et al. Parental role models and the decision to become self-employ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sonality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2(1):121-138.
- [7] ZHANG Y,DUYSTERS G,CLOODT M.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s a predictor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14(3):623-641.
- [8] ZELLWEGER T,SIEGER P,HALTER, F.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career choice intentions of students with family business background[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1 (5):521-536.
- [9] MUMGAI E,VELAMURI S R. Parental entrepreneurial role model influence on male offspring:is it always positive and when does it occur?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1(2):337-357.
- [10] EVANS D S,JOVANOVIC B. An estimated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choice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97(4):808-827.
- [11] BANERJEE A V,NEWMAN A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2):274-298.
- [12] 尹鸿飞,张兵,郝云平. 信贷约束与农村家庭创业绩效:影响效应及损失估算[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76-89, 189-190.
- [13] 童玉芬.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化特点及面临的挑战[J]. 人口研究,2014 (2):52-60.
- [14] LIU Y,WANG W,CONG Z,CHEN Z. Effect of older adults in the family on the sandwich generation's pursuit of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J]. Ageing & society,2022 (2):331-350.
- [15]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7-16.
- [16] 刘一伟. 互补还是替代:“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基于城乡差异的分析视角[J]. 公共管理学报,2016(4):77-88,156.
- [17] 陶涛,刘雯莉,李婷. 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个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家庭养老支持分工[J]. 社会学研究,2021(5):25-46,226-227.
- [18] 陈建梅,刘子荣. 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国际比较及中国路径实现选择[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2(6):50-62.
- [19] POWELL G N,EDDLESTON K A. Linking family-to-business enrichment and support to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do female and male entrepreneurs experience different outcom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 261-280.
- [20] REHMAN S,ROOMI M A. Gender and work-life balance: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f women entrepreneurs in Pakistan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012(2):209-228.
- [21] 朱晨,杨晔. “啃老”还是“反哺”? ——老年抚养对子女创业决策的双重影响[J]. 经济科学,2018(5):94-105.
- [22] 张博,胡金焱,范辰辰. 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家庭创业收入——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J]. 经济评论,2015(2): 52-67.

- [23] 杨军,张龙耀,姜岩. 社区金融资源、家庭融资与农户创业——基于 CHARLS 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2013(11):71-79.
- [24] 江求川,代亚萍. 照看子女、劳动参与和灵活就业:中国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J]. 南方经济,2019(12):82-99.
- [25] 王正位,李梦云,廖理,等. 人口老龄化与区域创业水平——基于启信宝创业大数据的研究[J]. 金融研究,2022(2):80-97.
- [26] SHELTON L M. Female entrepreneur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venture performance: new insights into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06(2):285-297.
- [27] 王萍,常超群,潘霜,等. 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及心理福祉影响的追踪研究[J]. 人口研究,2023(5):32-45.
- [28] 韩中,权芷瑶,冯文萍. 隔代照料对已婚夫妇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 CFPS 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J]. 社会政策研究, 2022(2): 41-52.
- [29] 印子. 分家、代际互动与农村家庭再生产——以鲁西北农村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21-29,155.
- [30] 汪伟,咸金坤. 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创业决策[J]. 中国人口科学,2020(1):113-125,128.
- [31] 徐娜娜,廖红君,樊纲治. 老龄化背景下住房负担能力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来自 CHFS 数据的证据[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4(2):17-24.
- [32] 周广肃,樊纲.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创业选择——来自 CFPS 数据的验证[J]. 经济评论,2018(5):134-147.
- [33] 杨凡,何雨辰. 中国女性劳动供给中的“母职惩罚”[J]. 人口研究,2022(5):63-77.
- [3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8日)[EB/OL]. (2017-10-08) [2024-01-13].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613660>.

(责任编辑:杨南熙)